

道娜·托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初庆东

【提要】 道娜·托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史家之一,她在译介马列经典著作、书写英国工人运动史、投身政治活动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托尔虽是语言专业出身,但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用毕生精力为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汤姆·曼作传。这部传记成为英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之一,生动地再现了汤姆·曼时代普通民众的创造性活动。托尔还积极推动建立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深刻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等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研究,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道娜·托尔 汤姆·曼 马克思主义史学 英国

道娜·托尔(Dona Torr)是英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到英文世界的先行者,也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最具影响的成员之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吊诡的是,除了曾经聚集在托尔周围的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等年轻历史学家对她的崇敬外,她的事迹鲜为人知,成为被人们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随着托尔个人档案的公布,在戴维·伦顿、安东尼·豪等学者的努力下,托尔的活动与贡献获得肯定。^①国内学界虽然关注到托尔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影响,但尚无专论面世,故笔者不揣谫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托尔的学术活动及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一、道娜·托尔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托尔生于1883年4月28日,她的父亲是英国切斯特大教堂的牧师,信奉安立甘宗。这种家庭背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并非孤例,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出生于一个严格遵守安立甘宗(后改为卫斯理宗)的家庭;休·多尔顿(Hugh Dalton)的父亲是温莎圣乔治教堂的牧师。^②托尔有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编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David Renton, “Opening the Books: The Personal Papers of Dona Torr”,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52 (2001), pp. 236 - 245; Antony Howe, “The Past is Ours!: The Political Usage of English History by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ole of Dona Torr in the Creation of Its Historians’ Group, 1930 - 56”,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4.

② 奥利弗·施赖纳(1855—1920)是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社会理论家,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激进社会评论家之一,著作包括《非洲农场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梦想生活与现实生活》(*Dream Life and Real Life*)、《梦》(*Dream*)、《妇女与劳作》(*Woman and Labour*)等。休·多尔顿(1887—1962)是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曾担任贸易大臣、财政大臣,代表作是《财政学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哥哥是一名准将,曾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和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军事参赞。对于她的家庭情况,我们仅知道这些,托尔好像有意掩盖她的私人信息或个人情感。^①这可能与她在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中成长起来有关。^②

托尔从小接受系统的教育,她成长的时代正是受教育女性开始自立谋生的时代。她最初在家接受私人教师的辅导,随后到海德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继续深造。她在海德堡大学学习语言、音乐和哲学,比较早地接触黑格尔的思想,这为她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奠定了基础。她可以熟练使用德语,这对她后来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很有帮助。1911年,托尔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英语和希腊哲学,在1914年获得英语专业荣誉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托尔摆脱她那个阶级的文化提供了机会,她因反对战争而在战后加入工党。托尔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持反战立场的左翼报纸《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工作,并在这里与她未来的丈夫沃尔特·霍姆斯(Walter Holmes)相遇。霍姆斯是钢琴调音师的儿子,很快成为英国共产党的首席记者。1920年,托尔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1924年,她前往莫斯科,以翻译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托尔担任英国共产党周刊《工人生活报》(Workers' Life,《工人日报》的前身)的编辑,并在日后成为《工人日报》的主要组织者和专栏作家。托尔还在当时英国唯一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出版机构劳伦斯·魏莎特(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工作,这一经历为她后来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便利。

英国共产党建立之时,正是世界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为协助世界各地成立共产党,共产国际选派英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成员到海外活动。1925年,托尔进入英国共产党殖民委员会,在海外工作多年。尽管我们难以确认托尔的具体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托尔的工作很成功。^③当她返回英国后,她与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和负责英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帕姆·杜德(Palme Dutt)等英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过从甚密。托尔全身心投入英国共产党的事务中,从没有因为写作任务繁重而耽搁她的政治义务。与她共事的同志们对她在1926年大罢工期间骑自行车四处分发宣传册印象深刻。^④即使党务缠身,托尔依然坚持阅读,从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出她阅读广泛,从各种不同的书籍中寻找灵感,她的读书笔记从20年代中叶起摘录了罗莎·卢森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霍理士(Havelock Ellis)、威廉·华兹华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亚里士多德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等人的著作。^⑤后来她对这种阅读方式予以深刻反思,她在给杜德的信件中说道“我往往陷入琐碎的研究而不能自拔……以致无所事事。”^⑥

1934年,托尔回到莫斯科,为共产国际担任翻译。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工作,并可能在此接受专门训练,这为她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基础。同年,托尔翻译和编辑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选集》,翻译底本是阿多拉茨基(A. Adoratsky)编辑的单卷本选集。埃里克·霍布

① Bill Schwarz,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56",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s.,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Hutchinson, 1982, p. 67.

② V. G. Kiernan, "Torr, Dona Ruth Ann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edition, <https://www.oxforddnb.com/> [2020-02-13]

③ David Renton, *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Zed Books, 2004, p. 106.

④ David Renton, "The History Woman", *Socialist Review*, No. 224(1998),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sr224/renton.htm> [2020-01-16]

⑤ David Renton, "The History Woman".

⑥ Antony Howe, "Dona Torr", in Keith Gildart and David Howell, eds., *Dictionary of Labour Biography*, Vol. 12, Palgrave, 2005, p. 276.

斯鲍姆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很少是用英语写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也不多见……然而(英国的)唯物史观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之上的。”^①托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也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1938年,杜德在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后,将编译《资本论》的任务交由托尔负责。在托尔看来,《资本论》就是一部英国史,而1842年恩格斯第一次到访英国为该书提供了灵感。^②托尔认为,翻译《资本论》的目的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英国化,用英国本土的术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

1939年秋,为证明英国共产党遵从苏联的命令转而反对战争的正当性,托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选编两卷本文集《马克思主义、民族与战争》。该书在1940年出版,托尔在书中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③托尔指出,该书旨在解释阶级斗争与战争的关系,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她认为,如果读者能够“将自己放到历史创造者的位置上”,那么她的目的就达到了。托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要理解过去和现在,而且要创造未来。它的目的是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在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人类有意识地集体控制他们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人类将放弃人与人之间盲目的战争,摆脱‘动物的生存条件’”。^④1940年,托尔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1年,她整理了马克思从1853年到1860年间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新闻评论,以《马克思论中国》为题出版。她还翻译季米特洛夫的《狱中信札》,以证明1935年英国共产党转向人民阵线是正确的抉择。

在翻译之外,托尔一直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特别着迷于汤姆·曼(Tom Mann)的故事。1936年,为纪念汤姆·曼诞辰80周年,托尔出版了汤姆·曼传记的简本《汤姆·曼》,并在前言中承诺当年秋天出版全本。但当托尔完成《汤姆·曼和他的时代》的第一卷时,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从1950年开始,托尔受到疾病的折磨。即使是第一卷,托尔也是在克里斯托弗·希尔和A.L.莫尔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根据托尔的要求和她提供的大量笔记,希尔撰写了第六、七章,莫尔顿撰写了第八、九章。托尔原计划分三卷出版汤姆·曼的传记,但她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便谢世,遗留下来的第二卷前两章手稿和笔记由爱德华·汤普森整理,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创办的期刊《我们的历史》(Our History)第26、27期连载。《我们的历史》第38期又出版了托尔遗留的关于汤姆·曼在大洋洲活动的手稿。^⑤在《汤姆·曼和他的时代》第一卷出版的1956年,托尔已病入膏肓,无力顾及此时英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危机。^⑥1957年1月8日,托尔在米德塞克斯郡埃奇韦尔(Edgware)总医院病逝。

二、为汤姆·曼立传:道娜·托尔的历史书写

汤姆·曼是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影响波及欧洲、美洲、南非和大洋洲。他生于1856

① E. J. Hobsbawm, "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urice Comforth, 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Essays in Honour of A. L. Mort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22.

② David Renton, "Studying Their Own Nation without Insularity?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Reconsidered", *Science & Society*, Vol. 69, No. 4(2005), p. 562.

③ David Renton, *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p. 107.

④ Dona Torr, ed., *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Lawrence & Wishart, 1940, p. 10.

⑤ 第一卷覆盖的时间段是1856—1890年,第二卷前两章的时间段是1890—1910年,汤姆·曼在大洋洲的时间是1902—1909年。

⑥ 参见初庆东《论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年,早在1885年就成为社会主义者,1910年成为工联主义者,1920年成为共产党员,他为工联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服务了半个多世纪。在汤姆·曼的葬礼上,波立特称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领袖”,他的生命“完美诠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①托尔如此描述汤姆·曼的人生经历:

40多岁时,他已在工人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有7年,声名远扬。19世纪9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的政府鉴于他的活动而禁止他入境。50岁时,他因为在墨尔本争取言论自由而第一次落狱。55岁时,他领导罢工,将炮舰运往默西河(Mersey),成为利物浦的“独裁者”。56岁时,他号召士兵“不要开枪”,因而遭到煽动暴乱的指控,再次锒铛下狱。76岁时,他在监狱里被囚禁两个月……同年他被北爱尔兰驱逐出境。次年(1933年),他被加拿大驱逐出境。78岁时,他与共产党的领袖哈里·波立特一起在斯旺西(Swansea)接受审判,罪名是煽动叛乱。^②

托尔深深地被汤姆·曼的人生经历所折服,对他为英国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所感动。她甚至将汤姆·曼的人生格言写在著作的扉页上,即“信我所信,我希望随时间流逝我会更加面目可憎”。^③

汤姆·曼希望以社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国际友人的身份,改变黑暗、非理性与战争的旧秩序。在托尔看来,汤姆·曼在1885年至1939年间从未改变其奋斗目标:(1)社会主义,消灭贫困;(2)革命的工联主义,将工人阶级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3)联合,带领整个无产阶级和它的盟友走向胜利。托尔总结道:“(汤姆·曼)的人生故事表明了一个事业的多条道路。”^④托尔希望通过追踪汤姆·曼这样一个工人的创造性活动,透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新旧力量的斗争,这也孕育了当今世界的关键特征。换言之,托尔撰写汤姆·曼的传记,其目的是以汤姆·曼的人生经历为切入点,考察这一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史,为分析今日之世界提供历史的脉络。

在《汤姆·曼和他的时代》出版前,该书的主要内容囊括在小册子《汤姆·曼》中。《汤姆·曼》的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密切相关。汤姆·曼是英国共产党改变其布尔什维克形象为纯正的英国政党的理想人物,正如1935年杜德建议将汤姆·曼塑造为英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时所言,汤姆·曼是“我们仅有的装饰”。^⑤英国共产党要把汤姆·曼包装成活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英国的环境中,是英国本地的传统,而不是布尔什维克输出的产物。为此,波立特选中可靠的托尔来撰写汤姆·曼的传记,以致霍布斯鲍姆后来批评托尔写的传记是“圣徒传记”。^⑥汤姆·曼的魅力不在于他如何正确地遵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方针,而是他在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扎根英国开展工人运动。汤姆·曼的“英国性”(Englishness)是英国共产党所看重的,而如何将汤姆·曼与英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将之塑造成英国共产党的“圣徒”,便是英国共产党和托尔所要做的事情。

① Cited in Antony Howe, “‘Our Only Ornament’: Tom Mann and British Communist ‘Hagiography’”, *Twentieth Century Communism*, Vol. 1, No. 1, 2009, p. 91.

② Dona Torr, *Tom Mann and His Times*, Vol. 1, Lawrence & Wishart, 1956, p. 16.

③ 原文为“Knowing what I know, I hope to be increasingly dangerous as the years roll by”, 参见 Dona Torr, *Tom Mann and His Times*, Vol. 1.

④ Dona Torr, *Tom Mann and His Times*, Vol. 1, p. 17.

⑤ Kevin Morgan, *Harry Pollit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

⑥ Antony Howe, “Dona Torr”, p. 279.

为反对法西斯的崛起,共产国际在1935年8月2日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党利用本民族的传统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尽管汤姆·曼并非英国共产党的唯一人选,但他作为当前健在的人选,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汤姆·曼是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的代表,并且与19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的起源直接联系在一起。^①1934年威廉·莫里斯百岁诞辰之际,佩奇·阿诺特(Page Arnot)将莫里斯视为共产主义的先行者,代表着英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从英国历史中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一做法在汤姆·曼和波立特受审时发挥到极致,同时将汤姆·曼与莫里斯联系在一起,因为两人共同参加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②1935年1月,杜德请求波立特对汤姆·曼在党内的地位给予官方认可。1937年,汤姆·曼进入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并在1938年担任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

托尔的《汤姆·曼》便是英国共产党利用名人进行宣传的出版工程的一部分。在托尔接受波立特安排的这一任务时,她放弃了手头正在进行的对艾琳娜·马克思的研究计划。托尔虽然语言能力惊人,但她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为汤姆·曼立传是她第一份独立承担的历史研究工作。托尔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她的雄心不仅仅是宣传,而是要将列宁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传记写作中。在莫斯科沉浸在理论著作中的经历,使她能够将激进社会活动家汤姆·曼和革命领袖列宁在生活中的相似之处,以及恩格斯的一些观点联系起来。《汤姆·曼》传递了反工党的信息,提供了一部激进的劳工运动史,传播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观念。^③尽管托尔对这本小册子并不满意,甚至想付之一炬,但它还是受到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认可,并将之作为英国共产党开展工人教育的教材。

《汤姆·曼》完成后,托尔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不忘撰写篇幅更大的汤姆·曼传记,直到1956年终于完成第一卷。托尔认为,历史是人类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记录,其中工人阶级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历史值得大写特写,但现实是中产阶级历史学家有意遮蔽这段历史。^④这就是托尔撰写《汤姆·曼和他的时代》的初衷。该书第一卷共有四部分,总共17章。第一部分题为“黄金时代”,讲述了汤姆·曼从沃里克郡的小孩(1856—1870)到工业学徒(1870—1877)的成长历程。第二部分题为“走向蝶变”,从汤姆·曼到达伦敦进入工厂讲起,一直讲到1885年汤姆·曼加入社会民主联盟。汤姆·曼在1885年之后的故事成为英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组成部分,他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为新社会而奋斗。托尔在叙述汤姆·曼的社会主义生涯之前,先对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历史进行梳理,从17世纪的平等派到19世纪的宪章运动,这构成了第三部分“插曲:走向自由”的主要内容。该部分的焦点不是汤姆·曼,而是为第四部分提供历史背景。第四部分“社会主义者汤姆·曼”是本书的重点,托尔用近一半的篇幅(九章)来写这部分。该部分从1885年汤姆·曼成为社会主义者开始,写到1889年9月汤姆·曼领导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获得胜利为止。

《汤姆·曼和他的时代》是一部杰出的传记作品,是英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之一,生动地再现了汤姆·曼时代普通民众的创造性活动。^⑤该书还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视角,认为普通民众可以改变社会,社会可以由工人塑造,提供了从底层创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⑥

① Antony Howe, “‘Our Only Ornament’: Tom Mann and British Communist ‘Hagiography’”, p. 93.

② Antony Howe, “‘Our Only Ornament’: Tom Mann and British Communist ‘Hagiography’”, p. 96.

③ Antony Howe, “‘Our Only Ornament’: Tom Mann and British Communist ‘Hagiography’”, p. 101.

④ Dona Torr, ed., *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pp. 10, 19; *Tom Mann and His Times*, Vol. 1, p. 15.

⑤ David Renton, “Opening the Books: The Personal Papers of Dona Torr”, p. 239.

⑥ David Renton, “The History Woman”.

三、道娜·托尔与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

在托尔的学生和赞赏者看来,她最大的贡献是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帮助和引导。在托尔始终如一的兴趣与支持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她为中心逐渐成长起来。^①1954年,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莫里斯·多布、希尔和萨维尔共同为托尔七秩荣庆论文集撰写序言,他们认为托尔使他们“感受到历史的激情”,“历史不是枯燥的文字,不是王侯将相的活动,也不仅仅是事件。历史是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喜悦”。最重要的是,托尔让他们对前辈们报以深深的同情之理解,并持有一种审慎的乐观。^②

托尔对于希尔、萨维尔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这一学术组织完成的。历史学家小组是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大本营”,旨在延续人民阵线和进步史学的传统。托尔参加了历史学家小组第一次会议,与希尔、霍布斯鲍姆、罗德尼·希尔顿等人一道讨论如何修订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③托尔是历史学家小组集体活动的组织者,她利用担任劳伦斯·魏莎特出版社主任和总编辑的便利,组织历史学家小组集体编纂“制造历史”丛书。这套丛书计划涵盖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旨在阐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该丛书精选“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普通民众的言语和思想”,主张普通民众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宪政或精英机构的历史。^④

对英国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引力中心”,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引发两次激烈讨论,托尔始终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影响。^⑤1940年,希尔出版《1640年英国革命》一书,将英国内战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这引发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的第一次争论。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一开始认为希尔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托尔是希尔的坚定支持者,她对希尔的“开创之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成功使思想自由的氛围更加浓厚。她说道:“这不仅是政治的胜利,也是理论的胜利。”^⑥二战结束后,历史学家小组为纪念英国革命300周年而再次开启争论,托尔再一次支持希尔的观点。1948年1月14日,托尔致信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称这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胜利”,“接受(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⑦这场胜利最明显的标志是1948年7月以历史学家小组16—17世纪分组的名义在《共产主义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国家与革命》。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希尔、皮尔斯和托尔起草了这篇文章。^⑧这篇文章成为此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释英国革命的正统,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其他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

① John Saville, 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Dona Torr*, Lawrence & Wishart, 1954, p. 8.

② John Saville, 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Dona Torr*, p. 8.

③ Minutes of the Historians' Conference, June 29th - 30th, 1946, CP/CENT/ CULT/05/11.

④ Alastair MacLachlan,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olutionary England: An Essay on the Fabrication of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y*, Macmillan Press, 1996, p. 83.

⑤ Raphael Samuel,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1880 - 1980: Part One", *New Left Review*, No. 120(1980), p. 84.

⑥ David Renton, *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pp. 107 - 108.

⑦ David Parker, ed., *Ideology, Absolutism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Debate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Historians 1940 - 1956*, Lawrence & Wishart, 2008, p. 39.

⑧ The 16th - 17th Century S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ommunist Review*, Vol. 28, No. 3(1948), pp. 207 - 214.

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共产党历史学家之一,托尔在历史学家小组中具有主导地位,她是历史学家小组的赞助人。维克多·基尔南认为托尔是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共产党的联络人。^①霍布斯鲍姆将她比喻为“乐善好施的女修道院院长”,监视着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②希尔承认托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情捍卫者,但他认为不应将托尔与党的御用文人(例如杜德)相混淆。他总结说“实际上,她(托尔)对历史的了解要比我们多的多,思考的也更多;而且她让她的著作、学识和智慧为我们所用。”^③希尔将托尔描述为“一位高贵的老妇人”,是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风云人物;萨维尔也说托尔对他们十分重要,赞扬她是一个博学之人。^④同为女性史学家的多萝西·汤普森认为托尔作为一个学者,其最大的缺点是慷慨,常常为其他学者审阅著作而搁下自己的工作。她盛赞托尔写出的文字充满学识和卓见,她的谈话洋溢着智慧和敏锐。^⑤

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托尔对希尔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诺曼枷锁》一文中,这篇文章是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为托尔所编著的纪念文集之首篇。希尔指出这篇文章受益于托尔的著述,而且是在他与托尔的讨论中产生的。^⑥他在文章开篇指出,诺曼枷锁的理论有多种形式,但其核心内容是“在1066年之前盎格鲁-萨克逊居民是自由而平等的,他们通过代议制机构自己管理自己。诺曼征服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建立了一个外来国王和贵族的暴政。但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失去的权利。他们为恢复(失去的权利)而不断斗争,并取得各种胜利。妥协的成果(例如《大宪章》)时不时会被他们的统治者夺走,而失去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传统不断激励着(他们)向诺曼篡夺者的继任者提出要求。”^⑦希尔认为,诺曼枷锁作为“一种原始的阶级的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完全是世俗的,而在18世纪之前大多数民众反抗的理论都带有宗教色彩。这一理论将国王、教会和领主标记为人民的敌人,认为统治阶级是外来的,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悖,因此“国家是人民的”。尽管英国工人运动已经抛弃了诺曼枷锁的理论,但希尔的文章旨在梳理关于诺曼枷锁的各种观念,以期使“我们更能意识到连续的、民众的爱国传统,这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⑧希尔认为,诺曼枷锁的理论并未从历史上消逝,而是被纳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中。^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诺曼枷锁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诺曼枷锁理论中有益的内容,包括政治的阶级基础、普通人民对英国性的强烈意识、父辈的斗争、有产的统治阶级在本质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同。希尔最后呼吁工人阶级必须站出来,成为“英国的捍卫者”。^⑩希尔对诺曼枷锁理论的梳理,实际上暗含了历史学家小组共同的主题,即证明英国共产党是英国人民激进主义漫长传统的继承者。

爱德华·汤普森的学术研究也深受托尔的影响,他在1955年出版的《威廉·莫里斯》的“前言”

① Antony Howe, “Dona Torr”, p. 280.

② David Renton, “The History Woman”. 在多萝西·汤普森给笔者的邮件中,她认为霍布斯鲍姆等人强调经济,不满于托尔的文化研究方法,邮件日期是2010年12月5日。

③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9.

④ Antony Howe, “Dona Torr”, p. 278.

⑤ 多萝西·汤普森《我和爱德华·汤普森》唐松根编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⑥ Christopher Hill, “The Norman York”, in John Saville, 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Dona Torr*, p. 12.

⑦ Christopher Hill, “The Norman York”, p. 11.

⑧ Christopher Hill, “The Norman York”, p. 12.

⑨ Christopher Hill, “The Norman York”, p. 64.

⑩ Christopher Hill, “The Norman York”, p. 66.

中写道“本书从酝酿到完稿,始终贯穿着(托尔)对我的鼓励、友谊与批评。为了解答我的疑问或是审阅我的书稿,托尔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到一边,以致我认为本书的部分内容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我们合作的产物,托尔引领性的观点在这种合作中发挥主要作用。托尔是一位天赋异禀、全面发展和慷慨助人的共产主义学者,能够与她在一起是三生有幸。”^①1963年,汤普森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此声誉鹊起,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地位。汤普森的这部成名作也受到托尔的影响。托尔认为英国的非国教传统与社会底层的激进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是独立工匠。托尔还强调卫斯理宗对英国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作用,她写道“工人阶级的激进者沿袭了卫斯理宗的组织形式,继承了数世纪以来的非法组织传统。”^②《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相关内容呼应了这些论述。汤普森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放出来。”^③在谈及卫斯理宗时,他又指出“卫斯理宗间接地助长了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组织能力”,他关注卫斯理宗独特的组织形式如何向工人阶级结社团体过渡的问题。^④

尽管托尔是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领路人”,但在她去世后很少有人去想起她,或是评价她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除一些悼文外,没有人为她撰写文章或传记。这种沉默的一个原因,是《汤姆·曼和他的时代》出版时熟悉她的那些历史学家忙于党内斗争,当她去世时这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已经脱离英国共产党。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托尔身为女性在那个时代仍处于依附地位,不受重视。^⑤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史学家才关注女性在英国激进运动中的作用。^⑥值得宽慰的是,托尔作为希尔、汤普森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导师,通过他们影响了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和创办《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的拉斯金一代,^⑦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430079)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①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awrence & Wishart, 1955, p. 8.

② John Stephen Enderby, “The English Radical Tradition and the British Left, 1885 – 1945”,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2019, pp. 243 – 244.

③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④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31—33页。

⑤ David Renton, “Opening the Books: The Personal Papers of Dona Torr”, p. 237.

⑥ See Karen Hunt, *Equivocal Feminis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and the Woman Question, 1884 – 19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4.

⑦ 关于希拉·罗博瑟姆的研究,参见梁民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希拉·罗博瑟姆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关于《历史工作坊》的研究,参见贺五一《英国的历史工场运动》,《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

image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mportant stages based on the sources and natures of these images: from illustrations in traditional history books, independent collections of images, to specialized image studies. With the rise of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1980s, images becam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for some historians. In adopting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whose goal i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mentality and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Revolution. It provides new solution to examining issues such as the Revolution's differentiated appeals to various social groups. However, many challenges in adopting 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main. Sometime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mag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s, for example, missing, and one cannot clearly identify the audiences for such research. At present, historians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striv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history by breaking disciplinary barriers, connecting the history of images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or social history, and sharing online resources.

Dona Torr and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Chu Qingdong

Dona Torr, as one of the few female historians in the community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of classic works of Karl Marx, historical writing of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communist movements in Great Britain. Although she had a background in linguistics, Torr was deeply interested in history, and spent her entire life on writing a biography of Tom Mann who was a leader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The biograph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Marxist historical monographs, celebrating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common people of Tom Mann's times. In order to develop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orr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such as Christopher Hill and Edward Thompson. Through these efforts, Dona Torr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s View on Russian History and Its Values // Guo Dan, Zhou Gonggu

S. M. Soloviev is a Russian historian who liv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 is considered a member of the "state school" and a "westerner" i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his twenty-nine volumes of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Soloviev articulates the following ideas in Russian histor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origin, geographical factors not only have shared Russian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 but they are also deep driving forces that construc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Russian (Eastern) hist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Western) history. On the dynam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pread of relig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i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rough which Russia has complete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constructed its religious identit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lan system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into a state based o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s the central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Russia's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convergent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Soloviev criticizes the views on Russian history both by the Slavophiles and Nikolay Karamzin i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atter used to dominate Russian historical circles at that time. In doing so, h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 Soloviev shows a strong concern of his contemporaneous society.

A Review of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 Xu Liang

In recent years,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ino-U. S. relations,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undergone through three distinc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first stage (1920s - 60s) is the initial stage; the second stage (1970s - 80s), characterized by ampl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important American historical works,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the third stage unfolded since the 1990s, and it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by offering mor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d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 review of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will help us recognize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 and find creative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